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

# 后危机时代要有塑造机遇的意识

□记者 金辉 北京报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日前在参加以“经济全球化的风险挑战与应对策略”为主题的北大赛瑟(CCISSR)论坛·2017(第十四届)时表示,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在全球化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全球经济发展出现了失速、失衡,英国、美国出现了声势浩大的逆全球化声浪,并且直接影响了美国和英国的政治格局。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思潮通过影响这些曾经领导经济全球化的国家的国内政治格局和经济政策,影响到全球的经济全球化走势。在这个时候讨论经济全球化问题,恰逢其时。

他认为,在全球化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回过头看,不可否认,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过去30多年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在任何时候,我们一方面要防范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另外一方面,要主动捕捉全球化带来的新机遇。

## 信息技术革命有风险但更是机遇

隆国强说,回顾人类发展史,重大的技术革命并不常有,经济学家所谓的长周期背后是重大的技术革命推动。今天,我们面临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此外,还有新材料、新能源、航天技术、深海技术等,而信息技术革命无疑是其中最大的技术变化。

人类的进步正处在加速中,信息技术革命意味着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这也是一个划时代的革命。如果我们仔细看看过去10年,人们身边发生的几乎所有的重大改变,包括经济生产和生活领域,都和信息技术革命息息相关。信息时代的到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深远影响。当我们在讨论工业4.0的时候,讲制造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平台化,与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因此,我们要特别重视信息化带来的这些重大机遇。

不可否认,信息化本身也是一个机遇和风险并存的东西。我们在享受信息化带来的简单、便利和快速的同时,也面临着个人隐私被泄露和侵犯、信息安全被威胁和破坏等问题,这也是对全人类提出了挑战。为了防止信息泄露带来的不安全问题,各国政府和企业通力合作,希望通过技术的进步和规制避免风险。我国也制订了《网络安全法》,今年6月1号即将实施。

信息的跨境流动本身也是一柄双刃剑。对于跨国公司来说,数据本身也变成了非常重要的资源,谁掌握了这些数据资源谁就掌握了重要的竞争力。数据本身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更不用说数据的跨境流动。

●目前,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后蕴含着诸多挑战,比如全球性的产能过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们的比较优势在削弱,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面临很多风险。

●但在后危机时代也存在很多机遇,大量人才向中国汇聚,一些跨国公司逐渐将一些更加高端的产业活动向中国转移,大量国内企业的海外并购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竞争力提高具有深远影响。

●当中国从曾经的经贸小国变成今天的经贸大国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让机遇多一点、挑战少一点。

对于跨国公司来说,要搞研发,整合全球数据资源,不能在国外用一个云,在中国用另外一个云。这就带来很多新的问题。总之,信息技术本身是一个重大机遇。一个国家,一个企业都必须抓住这个机遇。

## 抓住后危机时代里的发展机遇

隆国强说,目前,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后蕴含着诸多挑战。比如全球性的产能过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中国来说,我们原来传统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很多其它国家在你追我赶,一些东南亚国家都加入了出口导向的全球竞争,我们的比较优势在削弱。

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面临前有“虎”后有“狼”的风险,很多风险等待着我们。例如,全球资金跨境流动带来的美元升值压力,每次美元升值的周期都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危机。20世纪80年代的墨西哥危机,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都和美元周期性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现在美元又处在一个强势升值周期,过去两年,包括像中国这样经济前景良好的经济体,也面临资金大量流出的压力。我们的外汇储备从4万亿美元降到3万亿。再加上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等,全球经济中充满了风险。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面,在后危机时代还存在很多机遇。对中国来说,“引进来,走出去”都有很多战略性机遇。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主要靠结构升级和创新。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怎么能够把创新活力激发出来,提高竞争力,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我们发现,危机之后,大量人才向中国汇聚。虽然没有一个全口径的统计数字说明每年全球有多少人才流向国内,但是归

国留学人员的数字变化可以说明一些情况。2004年,归国留学人员在2万人左右,2016年这个数字达到40万,10年多一点的时间,增加了十几倍。

此外,还有大量的跨国公司高管和研发人员不断来到中国,这对建设一个创新型国家都有裨益。一些跨国公司逐渐将一些更加高端的产业活动,包括研发中心、高端制造、先进服务等加速向中国转移,以适应市场的变化。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和比较优势都在发生变化,对华投资的内容随之也发生变化。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也是中国建立一个创新型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走出去的角度来看,危机也创造了很多新机遇。大量的国内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获得了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研发能力、品牌和国际销售渠道等,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竞争力提高具有深远影响。除了这些并购活动以外,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企业可以到全球各国,按照不同国家的优势去设点,特别是利用他国先进的研发资源。以华为公司为例,虽然他的研发主体在国内,但是他在很多国家设立了研发中心,充分利用当地的技术、信息、人才优势为己所用。现在,我们会看到,无论是通过并购还是通过设立研发中心或者其他的投资,给了中国企业一个整合全球资源和全球市场的机遇。

## 要有塑造机遇的意识和能力

隆国强说,在风险与危机并存的时期,一个大国有塑造机遇的意识。

一个国家的很多东西是无法改变的,比如土地、人口等,还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自己所处的外部环境,这对大国和小国来说是不一样的。判断大国、小国

的标准不在于人口的多少,而在于全球影响力的大小。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影响力比较大,即使人口数量少,仍然被看作大国,反之,如果影响力很小,即使人口基数比较大,仍然会被看作是小国。中国曾经是一个经贸小国、政治小国,国际影响力有限。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已经成为一个经贸大国、政治大国,国际影响力更是与日俱增,我们的一举一动甚至我们的某个号召,都会影响外部环境。

对中国来说,当我们力量小的时候就要借势,现在我们已经成为大国,就要学会自己造势。我们在造势的过程中,一定要牢记,既利他又利己,不能完全自私地说,我做一件事只对中国有好处,对其他国家没有好处,这样是行不通的。我们造势做得好就是对全球治理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同时也是一个新兴大国责任的体现。

刚刚闭幕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作为一个新兴大国,我们通过“一带一路”区域合作的倡议推动全球化继续向前走。这里面蕴含了很多中国智慧。我们所倡导的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是不太一样的。有人说全球化已经进入4.0版本,我认为,可能并没有这么清晰。不过,类似“一带一路”倡议,确实展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充分运用好自己的影响力为全球化贡献力量,同时也给自己创造了很多机遇。

在全球化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美国仍然是一个超级大国,任何一个国家要想赶上他的影响力非常困难。但是,美国,从主观愿望和行动上来看,在全球治理中不断退却、后撤。当美国开始在全球治理中后撤,不愿意继续承担领导者角色的时候,国际社会会很紧张。实际上,国际上的主流声音认为,尽管经济全球化有很多问题,但是总体上来讲,它是好的,对全球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仍然希望维持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格局。习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演讲时表示,中国的大门对世界始终是打开的,不会关上,大家应该继续坚定维护全球化,这在国际社会反应非常热烈。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发改委共同主办了一个分论坛,有20多个国家的元首、几百名来自各国的部级政府官员参加。大家之所以踊跃参加,主要是因为看到“一带一路”倡议中蕴含的机遇,争先恐后希望搭便车、快车。“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区域经贸合作、国际产能合作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了更多新的机遇。这充分体现了一个大道理,当中国从曾经的经贸小国变成今天的经贸大国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就是机遇多一点,挑战少一点。

# 推进“一带一路”沿线经贸合作区建设

□沈玉良

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是指在中国和有关国家政府的指导下,支持有实力、有条件的中国企业在有关国家投资建设或与所在国企业共同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完善、主导产业明确、公共服务功能健全的产业园区,吸收中国、所在国或其他国家企业入区投资发展,推动双边和多边投资合作,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经贸活动。

## “一带一路”沿线经贸合作区现状

根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6年底,我国在2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在建设的合作区有56个,累计投资185.5亿美元,入区企业1082家,总产值506.9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10.7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17.7万个。

由于政府没有公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更详细数据,我们项目组主要通过调研,商务部网站信息、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网站以及相关境外合作区网站等信息,整理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3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一些情况。

首先,从成立时间看,境外经贸合作区基本上是2006以后成立的,其中2014年以后明显增加,由此可以判断,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基本上处于项目的建设初期,企业入驻等会明显增加。

其次,从投资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动机看,主要是资源寻求型、成本导向型和市场寻求型等三种类型。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一般以原油、木材等作为资源形成生产加工基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低收入国家以纺织、服装、皮革、金属加工等为主。在中等收入国家,机电产品则成为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主要产业配置地。

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企业情况看,一般以中国大陆企业为主,以及当地企业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企业,另外还有少量的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企业。

## 需要思考的三个问题

我国主导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当然以我国企业为主,因此,需要思考有关的三个问题。

**第一,从经济区角度看,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主体是我国企业,这个企业是否在当地市场具有竞争力。**

一是产品是否在当地或者与这个国家相关的出口市场有竞争力。如果以当地市场为主,那么已经进入或者新进入者的市场结构会对产品竞争产生影响,特别是许多发达国家的产品早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规模进入。如果没有持续的产品更新能力,仅仅是成本因素考虑,那么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不可持续的,因而产品持续竞争力包括在当地的研发能力以及专利技术在产品市场的应用。如果产品定位为与东道国相关的出口市场,例如这个国家与出口市场签署的自贸区协定,或者与相关国家实行普惠制(GSP),那么也要看同类企业的跟随策略,产品的更新换代也是重要的因素。

二是企业是否具备对外直接投资的组织管理能力。产品的竞争优势要内化为市场的领先优势,必须对企业的组织管理能力做客观的评价,包括与东道国各级政府以及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沟通能力、人力资源的管理能力、市场管道建设能力,这实际上涉及企业的本土化能力问题,这些与通过贸易方式进入市场的能力完全不同。

**第二,从政府角度看,两国政府和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关系。**

首先是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制度安排。有些经济特区在比较发达和制度比较完善的地区,可以按照当地特殊经济区的制度安排,但“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缺乏这方面的制度安排。这样就需要通过国家层面签署相关协定,保证境外合作区的法律效力,促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在投资、贸易便利化的落实和相关基础设施方面的完善。

其次,境外经贸合作区的要素流动制度安排。与单个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同,境外经贸合作区具有体量大、涉及要素制

度多样性等特点,在要素市场不完备的情况下,需要政府间沟通促进要素的流动。比如在资金方面,包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资金进出问题、不同货币的兑换问题、离岸贸易产生的资金结算问题、资金筹措问题等等;在人员进出便利方面,包括商务人员的进出便利、非熟练劳动力的跨境培训、人员招聘等问题。

最后,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需要国内制度的完善,例如与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的国际税收制度、资金监管制度等。

**第三,从境外经贸合作区角度看,涉及园区的选址和服务能力的提升问题。**

企业的选址与我们境外经贸合作区的选址密切相关,这会涉及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能力,与境外经贸合作区相关的周边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港口等)和所在区域的教育质量、医疗条件等相关。

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服务能力,首先是如何吸引国内优质企业入驻园区,使园区具有发展的可持续性。这种优质企业要与两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产业政策紧密结合,同时要国内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先锋企业的投资行为和投资能力(市场、产品专利)等了如指掌,甚至包括外资企业的对外投资策略。

其次,如何提高境外经贸合作区与当地政府的沟通能力,特别是涉及当地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所在地方的各种政策及其变化、执行情况,这些政策、法规需要随时与相关企业沟通。最后,如何为人驻企业提供配套服务,例如法律咨询服务,人员培训和招聘服务,又如企业的融资支持等,这些需要境外经贸合作区从供应链角度延伸到服务业。

## 完善经贸合作区建设的三个建议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是我国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因而是国家开放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从国家开放战略的角度去完善我国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制度,建立

财政部专家：

## PPP改革已成广泛共识

中国PPP改革已形成广泛共识,统一大市场初步建立,综合牵引作用逐步显现,符合中国实际的PPP发展道路正在形成。近日财政部、中央财经大学和中信集团联合主办的“‘中国PPP良好实践’国际研讨会暨‘中央财经大学PPP治理研究院’成立大会”上,财政部专家就当前中国PPP的发展现状作出上述判断。

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孙晓霞认为,我国PPP改革是一次体制机制变革,重塑了政府、市场、公众多元治理关系。在政府层面,PPP改革是一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创新,有利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经济层面,PPP改革是一项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市场需求为辅的机制变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公共服务层面,PPP改革是一种创新的公共服务供给管理模式,通过放宽市场准入、释放社会活力,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实践表明,符合中国实际的PPP发展道路正在形成。

财政部PPP中心主任焦小平指出,经过三年改革实践,中国PPP改革已形成广泛共识,统一大市场初步建立,综合牵引作用逐步显现。PPP市场蓬勃发展的驱动力包括:中央政府坚定的改革决心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红利;加快统一规范的PPP大市场建设;建立政府激励约束机制;适合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创新等。

针对下一步改革方向,焦小平认为要促发展与防风险并重,坚决制止“伪PPP”,以PPP进行政府兜底的融资,必须制止住;完善制度体系,夯实基础设施;逐步扩大全面实施范围;提高服务能力,优化市场发展环境。(金辉)

## 专家聚焦

## 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

由新华网投资者教育基地和金融界网站联合主办的“财富创造与传承:企业价值与社会责任”论坛暨《金融界2017中国民营上市公司财富报告》发布仪式近日在京举行。专家们就未来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之路展开讨论。

金融界董事长赵志伟在致辞时说:“上市公司是市场的核心要素,民营上市公司更是创新、活力的代表。”

原证监会研究中心正司局级研究员

黄运成指出,民营上市公司现在已经是我国上市公司的主体,并且今后这种趋势只会加强、不会削弱。他同时表示,推动民营上市公司快速发展五大因素分别是发展环境、产业和行业选择、公司治理、资本结构、收购兼并。

针对报告中发现的,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仍以家族控股为主,大部分民营上市公司选择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中国政法大学东亚企业并购与重组法制研究中心研究员杨洋表示,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家族企业的发展方向;从长远来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也许是一种必然。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认为,民营经济要做到创造、传承和可持续,需要把握住两个重大判断: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点要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财富的创造、传承、可持续必须实施动力转换,要用创新来替代大量资本、资源、劳动力的投入。(关新)

## 专家建议：

## 加强与东盟的金融合作

在近日举行的“中国-东盟金融合作学术研讨会暨‘东盟十国金融发展中的结构特征’新书发布会”上,与会专家围绕东盟国家的金融结构特征、“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东盟的金融合作等议题进行了研讨。

与会专家表示,东盟国家金融结构的普遍特征是具有鲜明的银行业主导特征,行业集中度高;证券市场相对落后,证券产品主要以场内股票市场和政府债券市场为主;以外资流入为主要开放金融特征。

与会专家认为,促进东盟金融一体化有助于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金融合作,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能够为中东盟间的经贸提供便利的条件。一方面东盟国家希望借助“一带一路”这个契机以及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这些有利条件,探寻与中国金融合作的最佳路径。另一方面,中国应秉持合作共赢的原则,在推进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及东盟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构建与完善中国与东盟国家金融合作的支撑体系。

据悉,此次论坛由中国-东盟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和广西大学主办、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和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承办。(钟研)